

台湾留美学生保钓群体研究

刘玉山

(龙岩学院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摘要]20世纪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爆发了保钓运动,运用社会学“群体”的概念,可以将保钓学生视作一个群体,但群体内部不同组成部分参加保钓的心态以及特征各有不同。从整体看,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保钓群体大都是具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而理想主义是钓统运动持续时间长久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台湾;留美学生;保钓;群体;钓鱼岛

[中图分类号]G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3)01-0097-08

一、保钓运动概况

1968年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成立“亚洲海域矿产资源联合探测委员会”,于10月12日至11月29日探勘黄海、东海海域。1969年发表《埃默里报告》(Emery Report),指出钓鱼台列岛周边可能是世界上石油储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甚至一个日本政府的测勘报告估计,在钓鱼台列岛附近海域的石油储量有150亿吨(1095亿桶)之多。^[1]这份报告引起了日本对钓鱼台列岛的野心,于是意图与美国私相授受。当时美、日双方就归还冲绳问题及即将到期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进行谈判时,称中国的钓鱼台列岛是“南西诸岛”的一部分,将随冲绳一并归还日本,这引起了台湾同胞和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1970年9月,台北《中国时报》的记者登上钓鱼台列岛中最大的钓鱼岛,并升旗,宣誓主权。随后日本迅速派人扯下旗帜,并销毁台湾渔民在钓鱼岛上避风的一切设施,这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当时台湾大学哲学所研究生王晓波和政治所研究生王顺的文章《保卫钓鱼台!》发表在《中华杂志》1971年11月第88号,文章一开头引用了“五四运动”的口号——“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文章指出:“我们的上一代用鲜血和头颅所挣回来的钓鱼台群岛,难道真要由我们的手中断送出去吗?”“我们要用力量和行动来证明,这一代的青年同样具有保卫国土的能力和决心!”^[2]这一慷慨激昂的保钓檄文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诚与激情。而《中华杂志》的主编胡秋原将这期刊物寄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子胡卜凯,胡觉得留学生必须要为保卫钓鱼台做些事情,于是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在美国爆发了。

[收稿日期]2012-11-2

[基金项目]本文系为2012年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A12304S;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课题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玉山,龙岩学院物理与机电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钓鱼岛问题。

各地高校迅速建立了保钓会,组织了“一·二九”、“一·三〇”以及“四·一〇”大游行,在此期间保钓人士还创作了保钓歌曲、编印保钓刊物、举行话剧演出、给美国总统尼克松写信和在报刊上登“保卫钓鱼台”的广告,这些措施对美国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归还琉球条约》审查报告明确说明美国只是将钓鱼台列屿的行政权交给日本,至于主权待由中日两国政府解决,这算作保钓运动对历史的交代,更是取得的最直接成果。^①

在保钓过程中,台湾当局对美国的保钓人士进行打击、迫害,让很多保钓人士认识到解决钓鱼台列屿问题指望台湾是不行的,必须两岸统一。于是保钓左派将保钓运动推进到了下一阶段——中国统一运动。统运是钓运的继续和升华,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保钓运动包括统运,统运是保钓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运期间,统运人士在美国大力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热情讴歌社会主义,他们自己也组织了读书会、讨论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还理论联系实际,深入为国民党控制的侨社进行宣传,破除了白色恐怖在侨社的影响。保钓统一运动发生在美国,远离祖国大陆,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却持续了10年时间,周恩来总理将这一运动亲切地称为“海外的五四运动”,保钓运动能否跟五四运动相提并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单就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所付出的牺牲,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许多人因为参与保钓被台湾当局列为“黑名单”而回不了台湾,自己在台的亲属也受到牵连,还有很多保钓人士甚至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

二、对保钓群体的划分

(一)社会群体的概念

“社会群体”是个社会学概念,“社会群体是指人们通过互动并按照一定的社会关系所结成的,具有持续共同活动的稳定集合体……广义的社会群体泛指一切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集合体,如军队、公司、教会等;而狭义的社会群体则是指由持续的、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而形成的小群体,如家庭、邻里、朋友圈子、游戏团体等”^[2]。社会群体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或要素: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具有直接、明确和持久的社会互动关系;群体成员具有共同的身份、群体意识和规范;有一定的群体边界;群体成员有某种共同的期待与行动能力或者说有一致的目标。

我们可以看到,参加保钓运动的人士的确就是一个“社会群体”,成员之间有互动,这种互动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颇有“串联”的意味。当时有以纽约为中心的保钓会,美中地区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美西地区有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围绕在这些中心,中国留美学生经常进行东西、南北的互动,如果说“一·二九”和“一·三〇”游行还只是本地区的游行(在联合国总部、日本驻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檀香山等地领事馆和日本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那么“四·一〇”华府大游行则是全美性的,不仅美西地区的留学生会开车或者坐飞机来华盛顿,就是加拿大的大学也派代表来参加。不管是钓运还是后来的统运,召开座谈会、讨论会非常多,留学生还深入侨社,演出话剧,各校循环播放电影等等,这些都是这个“群体”内部互动的充分体现。当然群体成员还为了“共同的利益”——保卫钓鱼台列屿这一目标而努力着。

按照群体的规模可以将群体分为大群体和小群体:大群体一般是指群体内的人比较多,如一定规模的社会组织、学校、企业、机关等;小群体是指群体内成员人数不多,规模有限的社会群体,一般在两人至几十人之间;按照群体成员的亲密程度可以划分为初级群体和次级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关系亲密的群体称为初级社会

①审查报告原文的译文如下:“委员会申明 在条约第一条的记录中,双方同意定义条约涵盖的疆域的坐标。这些坐标说明尖阁群岛(钓鱼台列屿)是美国管理疆域的一部分。同时,美国保留的军事设备中的两个也在尖阁群岛中。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都声明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在这方面的权力完全来自对日和约,从这约美国只接到管理权,没有主权。所以当美国把管理权转交给日本时,并不表示主权的转移(美国没有主权),也不影响任一方主权的主张。本委员会重申这个条约不影响任何一方对尖阁群岛或钓鱼台列屿主权的主张。”以上转引自钱致榕《还原历史,挑战今朝:保钓主权之争》,谢小岑、刘容生、王智明:《启蒙·狂飙·反思——保钓运动四十年》,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23页。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1971年11月初寄给钱致榕先生对《归还琉球条约》六页的审查报告,目前已捐赠给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室。

群体,典型的代表是家庭、邻里及朋友圈子;成员之间关系不那么亲密的群体称为次级社会群体,如多种组织;按照群体社会关系的性质可以分为血缘群体、地缘群体、业缘群体和趣缘群体;血缘群体以家庭为典型形式;地缘群体以邻里和同乡为典型形式;业缘群体以同业行会为典型形式;趣缘群体是指具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的人们结合而成的群体;按照群体的正规可以分为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正式群体指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有既定的目标,有固定的编制和群体规范,成员占据特定的地位并扮演一定的角色的群体;非正式群体指以个人好恶兴趣等为基础自发形成,无固定目标,无成员间的地位及角色关系的群体;以群体成员的身份及心理归属感可以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内群体是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之间有共同的归属感,相互团结与合作的群体;外群体是指凡是自己没有加入的由他人组成的或这群人与自己无关的群体。人们对外群体常表现出冷漠、轻视或偏见,缺乏忠诚、热情与合作的精神,尤其当内群体与外群体对立时,如与自己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白人对黑人,城市人对农村人等;此外还可以分为隶属群体和参照群体;隶属群体即个体所实际参加或隶属的群体,又译为“成员群体”;而参照群体是指这样一种人或群体,它或者为个人疏离或维持各种标准,或者当做个人与之进行比较的一种比较框架如大学生群体往往是那些想考上大学的高中生的参照群体,某个著名球队往往成为一些球迷的参照群体等。

无疑,保钓统一运动群体是大群体和次级社会群体,下面其实还包含有很多小群体,比如《科学月刊》联络网和“大风社”,这就是典型的小群体;同时,“大风社”又是典型的趣缘群体,因为该社是1968—1969年间由美国各地对政治、经济、社会感兴趣的留学生组成,共有三四十人^[4]。作为整个保钓群体,在保钓运动发生后,各地(主要是高校)相继成立了很多保钓会,如纽约保钓会、费城保钓会、堪萨斯大学保钓会、耶鲁大学保钓会、普林斯顿大学保钓会等,这些保钓会都是小群体,但由于地缘关系,一些地缘接近的保钓会又会有联合,如加州地区的12个高校保钓会成立了“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同样,西南地区也由10余个高校组成了西南保钓会。这两大联合体相对于保钓群体无疑是小群体,但相对于他们的成员又是大群体,而他们成员此时又是小群体。保钓群体虽然是次级社会群体,但它里面却有很多初级社会群体,很多以家庭为单位参加了保钓统一运动,如董叙霖和杨贵平夫妇、董庆圆和赵珉夫妇、夏沛然和王渝夫妇、吕克群和乔龙庆夫妇、许登源和陈妙惠夫妇等。

(二)按照保钓群体的身份构成划分

1.保钓群体的组成部分

保钓运动参加者的构成成分以中国留美学生为主体,也包括一大批华裔教授和青年教师,还有侨社的参与,这是一种划分法。由于当时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实行对外开放,所以中国留美学生多是台、港学生,大陆学生没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钓运动期间,许多著名的华裔科学家如杨振宁、陈省身、田长霖、吴家玮、吴大猷、丘成桐,一些文科出身的著名学者如赵元任、何炳棣、叶嘉莹等也都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根据运动参与者的家庭出身来划分,可分为高干子女、外省人(以军公教家庭居多)、本省人、香港人和美籍华人(侨社)五个部分。高干子女以袁旂、谢定裕、沈君山为代表。袁旂的父亲袁守谦,黄埔一期,在台湾曾任“交通部部长”,陆军二级上将。谢定裕的父亲谢冠生,做过台湾“司法院院长”。沈君山的父亲沈宗瀚曾任台湾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国际知名农业科学家,沈君山本人又是与连战、钱复、陈履安齐名的“四公子”之一。上述3人祖籍都在大陆,实际上也属于外省人。周本初认为,如果是父辈从中国大陆迁来台湾的,再加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识很深,那很自然就会倾向中国大陆,也很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5]保钓运动参与者中尤其是后来的“左派”往往外省籍居多,毕竟根在大陆,很多人在年幼时就离开家乡,渡海来到对岸,这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这部分人有很浓厚的爱国主义观念,在保钓运动和后来的中国统一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中有回国服务的如李椿萱、赵玉芬、杨思泽、廖秋忠等;还有入联合国工作就地报国的如龚忠武、林国炯、赖尚龙、刘大任、傅运筹、尹梦龙等。本省人中后来有一批在70年代申请回国服务,比如林盛中、吴国祯等。香港人比较积极的如廖约克、张东才、曹宏威、关文亮等。侨社如程君复、梅子强、陈天璇、罗兰等。从总体上说,保钓运动参与者中台湾留学生比香港留学生要多得多,而台湾留学生中外省籍参与的要比本省籍的要多,但在少数大学如奥克拉荷马大学反而本省籍的要比外省籍的还稍多一些。^[6]

2. 保钓群体各个组成部分参加钓运的心态分析

总体上说这几部分人参加保钓运动的心态和动机是不尽相同的。陈孔立先生在论及1945年以来台湾民众的集体记忆时所言:“外省人是1945年以后去台湾的,他们一般在大陆还有亲人,包括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大陆是他们的故乡,对大陆‘不免觉得若有所失,而患有一种强烈的怀乡病’。”^[7]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的《大江大海1949》就是对1949年渡海来台情况的真实写照。保钓发起人之一的王晓波在谈到外省人时特别提到乡土意识,他认为外省人自觉故乡在海的那边,且有他们最亲密的家人在大陆,虽青丝已成白发,但纠缠亲情的乡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他们个人的悲欢离合,也正是近代中国悲剧的一部分。^[8]比如保钓健将刘大任、张系国都是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随家庭迁移到台湾,“在大陆为了避开战乱进行迁移的流亡,返乡尚有希望的;而渡海来到另一个地理空间——台湾后,流亡行动中的空间迁移状态已经停滞下来,返乡的希望受到戒严法的限制。”^[9]作为作家,从他们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因随家庭来到台湾而对祖国大陆的深深眷恋,如刘大任的《红土印象》和张系国的《亚布罗诺威》等都反映了这一主题。我们发现,保钓运动中的骨干力量往往外省人最多,也最出力。一道鸿沟隔断了他们与故乡的联系,他们在台湾长大、求学,但对故乡与祖国大陆的眷恋应该说深藏于他们的内心深处,当20世纪70年代美日妄图私相授受我神圣领土钓鱼台列屿时,他们毅然站了出来,坚决捍卫我国领土。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保钓外省人更是将保钓运动推向了更高的阶段——中国统一运动。

本省人一方面因为“二·二八”的痛苦记忆还不是很遥远,另一方面他们看到社会主义讲究平等,尤其是消除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三大差别”,联想到日据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本省人的“二等公民”地位,没有受到平等待遇,新兴的社会主义更给他们以吸引。所以他们参加钓运乃至后面的统运就顺理成章了。^[10]所以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认识是他们参加钓运尤其是后来统运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不管是本省还是外省籍学生,他们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受到国民党在美国特务的监视和迫害,随时面临被吊销护照的危险,还要处处防范职业学生的“打小报告”,同时,“家里如果有父母兄弟在政府工作,多少会受其影响”。^[11]像反映20世纪70年代美国保钓运动最著名的两部小说,都是保钓当事人写的,巧的是两人都自认属于保钓“中间派”或“自由派”。虽然是小说,但从整个文章内容来看,仍有很大比例的真实度,至少有很多当时参加钓运人士的影子,故事情节写得也非常感人。一个是李雅明的《惑》,一个是张系国的《昨日之怒》,前者里面的主人公胡玉萍在美国的大哥以及后者里面主人公王亚男的丈夫洪显祖,都是对保钓运动持有反对或漠视态度的一类人,亦可由此窥探当时钓运人士面临的压力之大。

在保钓统一运动中参加者主体是台湾留学生,香港学生相对少很多,但用吴国桢的话说:“香港的同学,一旦有了意识,觉悟到‘殖民地意识’的思想禁锢,往往就能比台湾的学生有更彻底的转变。其中的原因,一是他们能认识到‘买办’体制的本质,二是他们比起台湾的学生敢言,比较没有白色恐怖的心理障碍。”^[12]诚然,正如刘大任所说:“那个时代台湾留学生不要说公开讨论国事,连上图书馆借大陆出版物都不太敢留下真实姓名。”^[13]香港学生和侨社侨胞不存在上述问题,国民党管不到他们,没办法对他们施加压力,他们就没有这个顾虑。而且保钓运动爆发时,很多香港学生都有参加过美国学生反战运动的经验,所以香港学生要比在台湾多为“乖乖牌”的台湾学生在从事社会运动方面更有“经验”一些,当然这只是就运动初期阶段而言。不过香港和侨社学生也有面临来自自身家庭的压力,比如程君复,他的父亲就非常反对他参加保钓以至后来的中国统一运动,“至死不能原谅他”^[14],父子二人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终生无语,未尝不让人感慨唏嘘。

(三) 按照保钓群体的学科背景来划分

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出国潮,大批学生赴美读书,尤以读物理的居多,原因有三:一是越是乱世,学生们越是倾向学理工科,觉得靠手艺吃饭最保险。二是李政道、杨振宁起到了非常大的榜样作用。三是容易拿奖学金。当时台大理工科有九成的人都出国了,当然目的地多是美国。^[15]台大保钓健将郑鸿生毕业于台南一中,当时一个年级20个班只有一两个是文科班,并被主流学生视为书读不好的边缘末流,在郑的父辈人看来,读文科的出路不是穷困潦倒就是成为贪官污吏,当然还有更可怕的,就是去触碰那禁忌的世界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殃及族人。^[16]

诚然,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与此同时,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又摘得诺奖,这些

都大大激发了大家学习理工科的风气,胡卜凯的父亲就告诫他说:“学理工科可以找到一份能吃饭的工作,不需要看人家脸色,最好是学理工。”^[17]胡卜凯就读的台北建国中学那一届10个班级,除了文法科和农科各一个班,其余8个班都是理工科,杨、李的诺奖也刺激了很多高中生都将物理系作为第一志愿,超过以前热门的医科和电机学专业。有趣的是,日后的保钓积极分子很多都是在台大大二从他系转入物理系的,如林孝信从化学系转来,胡卜凯从地质系转来,刘容生由电机系转来,他们又与以基隆中学第一名保送到物理系的刘源俊一起成了台大物理系的同班同学。这就是当时台湾本科阶段理工科兴盛的一个概况,即使放在今天,各个高中也还是理工科的班级占多数,但目前理工科兴盛的程度似难与那个时代相比较。

那么在台湾念完本科阶段教育,去美国攻读硕、博士的同学自然理工科会很多,老保钓李雅明就证实“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当中,学工的最多”。^[18]张东才也认为参与保钓运动的人学物理的比较多,确实与念自然科学的人不仅对事物好奇,而且不盲从权威,具有怀疑精神有关。^[19]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教育学者黄培先生经过认真的统计,也认为20世纪50和60年代来美的台湾学生,分散在美国各校,有些大学在通都大市,也有校址设于偏僻的大学城。但在散漫中,仍有原则可循,当时以学工程的人最多,学文史、法律和商科的较少。^[20]

参加20世纪70年代保钓运动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当时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在两万人左右,仅仅保钓运动高潮的标志——1971年4月10日全美华盛顿大游行就有超过2500人参与,当时因事没能参加钓运游行,还得向同学做好多解释,可见参加钓运在学生中的普遍性。所以能将前前后后参加保钓运动的人(主体是学生)罗列出来作最精确的定量分析来分析每个人的学科背景,这无疑是最科学的,显然这是我们无力做到的,但我们得出参加保钓运动的人以理工科为主体这样的论断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参加保钓运动的人中有社会科学背景的也不少,只是相对理工科学生少得多而已。就左派而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西地区钓运中心——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两位旗帜性人物:刘大任,政治学专业;郭松棻,比较文学专业。此外还有纽约地区的保钓干将哈佛大学历史学专业的龚忠武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心理学专业的徐守腾;美中西地区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王春生;奥克拉荷马大学政治学专业的林国炯;伊利诺大学法律专业的陈恒次;芝加哥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夏沛然;匹兹堡大学历史学专业的花俊雄。而当时的保钓右派中,骨干文科生还是很多的,比如李本京,圣诺望大学历史学博士;邵玉铭,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马英九,哈佛大学法学博士;郭仁孚,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张京育,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陈长文,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赵林,芝加哥大学文学博士;魏镛,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关中,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国际关系学院哲学博士等。邵玉铭也承认保钓左派理工科的居多,邵本人甚至对毛泽东著作一字一字、一篇一篇仔细阅读,就是为了与左派进行论战。^[21]可能是由于文科不像理工科找工作相对容易,因而对台湾的依附性相对大一些,所以这些文科出身的右派后来大多回到台湾,步入学界、政界。不管是保钓左派还是右派,上述例子都是在不同地区对钓运起了一定作用的知名的学生而已,其他不知名的文科生应还有不少。

三、保钓群体的特征

(一)保钓统运群体大多是具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

保钓统一运动是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发动的,具有爱国主义与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知识分子是一个近代西方词汇,就词源来说有两个来源,这在学界已经得到了公认。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当时较之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本身属于上流社会,接受了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他们对现行的专制制度和丑恶、不合理的秩序进行了批判,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第二个来源是1894年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个上尉,由于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这引起了一批具有社会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他们在1898年1月23日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后来这批为社会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诬蔑为“知识分子”。所以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知识分子论》中,按照知识分子“传统的”历史形象,将知识分子理解为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是真正的业余者,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22]我国研究知识分子的著名专家许纪霖教授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

人。”^[23]

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有其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不可能存在一种没有传统、横空出世的知识分子。法国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左拉时代的传统,法国知识界一直是左派的天下;英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在牛津和剑桥里面的一群学院派知识分子,在体制内寻求变革,是温和的,罗素算是英国知识分子中最激进的,但比起萨特来,还算温和得多;德国的知识分子受狂飙运动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比较大,他们更强调“内心的自由”,即通过逻辑的哲学思辨,达到内心的超越,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是矛盾的,复杂的。在我国,知识人在古代叫做“士”,春秋以前的“士”属于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层。春秋以降,“士”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到战国时代,士已经成为“四民”之首(士民、商民、农民、工民)。中国古代士人具有诸多优秀的品格,其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古代士人把参与国家政治视为自己的“天职”,把“治国平天下”当作崇高的理想追求。忧患意识就是“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所处困境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忧虑”^[24]。忧患意识来源于知识分子特有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来源于他们对社会、民族、国家前途深切的关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古代士人的真实写照。1995年钧统运资料编辑委员会在编辑《春雷声声》的序言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有强烈的经世济民思想。从孔孟的治国平天下,到北宋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南宋文天祥和岳飞的民族浩然正气,到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贯穿着一条忧国忧民的问政、从政、干政的伟大胸怀与抱负。”^[25]当然这种士的传统,大量吸收了舶来的理性知识人的成分,赋予了现代的意义。作为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保钧健将龚忠武先生在回忆钧运时,用史家独特的眼光这样写道:钧运群众几乎都是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士人传统的影响,加上钓鱼台事件让人很容易联想起中国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以起初大家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而踊跃投入钧运的。^[26]

周本初在分析保钧知识分子的特点时,用调侃的口吻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喜欢“多管闲事”,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27]美西柏克莱保钧健将刘大任说:“我一直自认是个知识分子。既是知识分子,那就必需坚持两件事:其一是不管什么场合,都应该站在民间这一边;另一是绝不使自己成为一名政客。我以为这样才能当一个批评家,并且在著述时,也才能经常保持客观的心情。”^[28]钱致榕在谈到保钧对其的影响时说:“最重要的是,使我了解,虽然能力兴趣都有限,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都有积极参与的责任及空间。这些体会,影响我一生。”^[29]台湾有的年轻学者以文学的视角在谈到保钧健将郭松棻和李渝夫妇时也说:“两人作为原本在学院内求学的知识分子,终因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责任心,而一头栽进了‘政治’与‘社会运动’(这里指投身保钧运动)的潮流中,并在这场运动当中经历人生的转折。”^[30]陈倬民在谈到参加钧运时说:“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血性,在面对自己祖国遭受欺凌、侮辱之际,在‘大我’与‘小我’的矛盾下,个人毅然地选择了前者。”^[31]我们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在美国的一群中国留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这种民族忧患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我神圣领土钓鱼台列屿面临危急时,他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宁可博士学位不要,在台湾的家人、亲戚受到威胁,自己回不了台湾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忧患意识既有凝聚在血液里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爱国主义的基因,更与近代1840年以来近代先驱者面对亡国灭种危局时所形成的民族忧患意识有关。

《峥嵘岁月 壮志未酬——保钧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编辑委员会在导言中认为保钧知识分子可以上溯到先秦的经典儒家的士传统,下承宋明清三代的儒家的士传统;上承钧运时期一再被台美和海外保钧群众征引的先秦经典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任重道远”的士的典范;特别是宋明清新儒家所树立的高大的士人风范,例如宋儒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明儒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的书生职志和历史使命感;甚至上升到宋儒张载为士人树立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民胞物与”的终极关怀和天地境界,来投入钧运,进行这场海外的文化革命的。^[32]

除此之外,保钧运动参与者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中华民族具有无数优秀的品质,比如刚健自强、贵和宽容、重德尚义、入世爱国、务实精神、忧患意识等。^[33]但中华民族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党的十六大报

告也作出这样的论断。正如保钓健将龚忠武先生所说:“海外华人以自己方式走爱国的道路……保钓运动就是海外华人、华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献身爱国、爱族事业的最生动的例子。”^[34]

(二)理想主义是钓统运持续时间很长的内在原因

理想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上又被称为法理主义、规范主义,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对格劳秀斯和康德等理想主义外事哲学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理想主义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早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其最初的代表人物是曾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其主要理论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样必须建立在自由民主的理念之上,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机制以及完善国际法与恢复国际规范,可以达到消除国际冲突,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最终实现和谐、稳定的世界秩序的理想。^[35]很显然,我们谈的理想主义与这个理想主义概念不是一回事,我们所讲的通俗的理想主义,是基于一种对于信仰的追求,或者用著名学者许纪霖的话说:“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都很缺乏个人意识,它们总是以某种超验的或历史的终极之物为本位,要求人们为之献身和奋斗。”^[36]联系到保钓统运参与者,很显然: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或者找个好工作、高薪职位在奋斗,他们参加保钓完全是出于民族大义;他们参加统一运动,是在学习的基础上,思想上开始认同祖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展开他们力所能及的行动。这完全是利他性的。

难怪保钓运动25周年时,有保钓人士撰写文章《保钓与理想》称:“人除了吃饭睡觉,家庭事业之外,总得有一点理想。当年反对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要求祖国统一富强的愿望,正是大家的理想……当年保钓朋友的可贵,除了年轻时代无私奉献之外,同样可贵的是,他们心中仍有理想,是社会大众,是国家民族的共同理想。”^[37]保钓健将曾志朗用“曾经不负少年头”来形容当时大家参加保钓的干劲十足,虽然没有居留权,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聚拢到华盛顿参加游行,甚至连住在哪里也不知道,更别说华盛顿的樱花是否盛开了,他们只知道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曾不禁感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常常被问到:那时候的热情和行动到底为了什么?时过境迁,回头看看那一段日子,再看看现在的学生们,总觉得好像欠缺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热情。”^[38]王正方回忆道:“都是一群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是什么因缘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单纯、奉献、全力以赴、不计利害,是我们以后数年之间共事的相同体验,实在是人生难得的际遇,弥足珍贵。”^[39]刘容生说,保钓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不是为自己,不为官、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年轻人有的一份热情、一个理想、一股力量,为了做一些认为该做的事情,为了追求未来一个更好的社会,为了子子孙孙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40]所以学者丘为君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一种带有高度理想主义的集体性抗议行动,这种理想主义多半属于利他或利于众生的道德性理想主义,例如平等的观念或社会正义问题等。而不是像追求学位或高薪工作机会等自利性的理想主义。^[41]王正方也认为,大家当时参加保钓都是自发,充满了理想,当时很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了一个问题,大家都上去了,确实完全是无私的。^[42]诚然,《台湾与世界》杂志1985年11月联络了一部分当年的保钓人士举行茶话座谈,就有很多保钓人士自认为当时他们是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其中一位就说:我要强调一点,当时参加钓运的人,不论台湾来,香港来,都是比较崇高的理想主义者,都很单纯,没有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家抛弃了自己的利益来参加。今天,台湾来的、大陆来的,大概都做不到这一点了。保钓发起人之一的沈平还记得,当时有些朋友带了耳机听《白毛女》,边听边流泪,这是觉得自己的国家不但多苦多难,而且许多历史上正义的事情被曲解。^[43]

事实上,从保钓参与者所成长的20世纪50和60年代的社会背景看,当时台湾社会思潮比较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当时的台湾社会比较朴实,也比较不那么现实和相对比较贫穷,这些都是孕育理想主义的土壤。所以林孝信先生说:“理想主义是促成轰轰烈烈保钓运动的根本因素。如果留学生缺乏高度的理想性格,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多人出钱出力,牺牲学业,不畏被列入黑名单,积极而充满创意地投入与个人功成名就无关的保钓运动。”^[44]林孝信先生这些话似乎也在说他自己,林先生是保钓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正是其为编辑《科学月刊》而在美国各个高校建立起来的联络网,促成了保钓运动很快之间成燎原之火,其“首义”之功不可没。随后林先生积极投入到钓运,期间不受国民党的利诱与威胁,最后被吊销了护照回不得台湾(直到台湾解严后的1988年底,21年后才回到台湾),还被芝加哥大学开除,即将到手的物理学博士学位也没有了,在美国也成了“黑户”。但他仍然在美国成立了“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支持在台湾受到迫害的民主人士如陈明忠、余登发、许信良等。其实以他的学习成绩,读的还是美国名校博士,回到台湾谋个好点的高校教职或是找个

好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事情,林国炯在回忆录中就说林孝信很会读书^[45],可是他却并没有将自己的个人事业前途甚至生计放在心上,而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钓运中,当年办《科学月刊》就是为了普及科学理念,如今40年了,还在出版,影响了台湾整整一代人,如今林先生还在为科普理念和社区大学理念在两岸开办学术研讨会、讲座进行宣传。林先生的个人经历很好地说明了保钓人的理想主义性格,这种理想主义在林先生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但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尤其在中国统一运动中,他们不顾自己安危,放映宣传祖国建设成就的电影,随时面临特务和职业学生的“小报告”,自发举办读书会,加强自我学习,这些事情没有充足的理想主义在支撑是不可能完成的。

参考文献:

- [1] 转引自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M].台北:正中书局,1986:28-29.
- [2][6][11] 春雷系列编辑委员会.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下)[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0:76、580、245.
- [3] 吴泽、文军主编.社会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23-124.
- [4][29][38][40][44] 谢小琴、刘容生、王智明主编.启蒙·狂飙·反思——保钓运动四十年[M].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81、20、7、63、39.
- [5][14][19][26][32][15][45] 春雷系列编辑委员会.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上)[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0:558、245、517、312、59.
- [7] 陈孔立.1945年以来的集体记忆与台湾民众的复杂心态[J].台湾研究集刊,2003(4):2.
- [8][42][43] 龚忠武等.春雷之后(三)[M].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2512、2444、2439.
- [9] 流放者的认同研究——以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刘大任、张系国为研究对象[D].新竹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班吴孟琳2008年硕士论文:9.
- [10][27] 周本初2012年4月13日访问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在院三楼会议室举行的座谈会时语.
- [12] 吴国桢.怀念永远的“保钓、统运”老友——关文亮先生[M].关文亮纪念文集.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325.
- [13] 刘大任.我的中国[M].台北:皇冠出版社,2000:50.
- [16] 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M].台北: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29.
- [17] 林照真.台湾科学社群40年风云——记录六、七十年代理工知识分子与《科学月刊》[M].台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32.
- [18] 李雅明.惑[M].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86:5.
- [20] 黄培.1950年代——1960年代的台湾留美学生[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1):23.
- [21] 邵玉铭.风云的年代——保钓运动及留学生涯之回顾[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61.
- [22]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71.
- [23]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
- [24] 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M].商务印书馆,2003:6.
- [25] 林国炯等合编.春雷声声[M].人间出版社,2001:6.
- [28] “知识分子”的文学——刘大任集序.台湾作家全集——刘大任集[M].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9.
- [30] 黄启峰.河流里的月印:郭松棻与李渝小说研究[D].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7):2.
- [31] 邵玉铭主编.风云的年代——保钓运动及留学生涯之回顾[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131.
- [33] 俞祖华、赵慧峰.中华民族精神新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 [34] 龚忠武.温故开新——海外华人走自己的爱国道路[EB/OL].<http://www.wyzsx.com/Article/Class14/201012/204935.html>, 2010-12-20.
- [35] 徐希军著.理想主义:胡适国际政治思想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4.
- [36] 许纪霖.另一种理想主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55.
- [37] 关文亮纪念文集[M].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272.
- [39] 陈映真.左翼传统的复归——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M].台北:人间出版社,2008:161.
- [41] 丘为君.台湾学生运动(1949-1979)[M].台北:稻香出版社,2003:10.

(下转第116页)

- [1] 王凌.当代大学生廉洁观调查——基于1799份问卷的分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33.
- [2] 李伯黍、燕国材.教育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 [3]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M].方福前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161.
- [4] 李景平、韩锐、雷艳.论大学生不廉洁行为及其矫治[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4):39.
- [5] 蔡娟.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着力点[J].理论探索,2012(5):48.

A Survey on College Students' Integrity View Education

Meng Hong Li Yu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Abstract: View of integrity is the basis and premise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grity education,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honest awareness, shaping of noble character and developing clean behavior habits. A survey of college students' view of integrity educ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from four aspects of cognition, emotion, will and behavior using a questionnair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certain sense of honesty, hating corruption, strong-willed, and able to resist unclean behavior. But there are some students who are cognitive unclear, more agreeable to corruption, poor-willed as well a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non-uniform. Based on the study,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reasons and presents some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View of Integrity; Education

责任编辑 裘晓兰

(上接第104页)

The Research on Diaoyu Islands Protection Campaign Staged by Taiwan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S. in 1970s

Liu Yushan

(Physic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LongY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1970s, Taiwan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S. started a Diaoyu Islands protection campaign. Using the "group" concept in sociology study, we can treat those students as one group. However, the different sectors within the group have different ment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In general, the students within the group all have high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have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pirit of scholar. On the other hand, idealism is the internal reason that kept the campaign running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Taiwan;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tect Diaoyu Islands; Group

责任编辑 裘晓兰